

· 公共管理 ·

宏观收入分配格局对总需求的影响

李 育¹, 刘 凯²

(1.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对外投资合作研究所, 北京 100710; 2.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2)

摘 要: 本文借鉴后凯恩斯主义要素收入分配理论, 将资本报酬划分为食利者利润和非食利者利润, 在理论上拓展了对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和总需求关联机制的认识。在实证方面, 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资金流量表数据, 通过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 考察了要素报酬与总需求的长期均衡关系, 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 由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存在, 中国的内需体系是工资领导型, 即总收入中工资份额的上升有助于扩大内需。第二, 考虑国外部门以后, 劳动力成本上升显著抑制了净出口, 由此中国的总需求体系为利润领导型。第三, 对总利润进行细分后发现, 总利润中企业部门利润过高是抑制内需的主要因素。随着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调整, 外部需求可能面临进一步减少的趋势, 因此, 逐步增加国民收入中住户部门收入和劳动报酬、降低企业部门留存利润份额是扩大内需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 宏观收入; 总需求; 后凯恩斯主义; 要素收入分配; 食利者利润; 非食利者利润

中图分类号: F01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76X(2018)12-0096-09

一、引 言

自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以来, 宏观收入分配(要素收入分配)格局与总需求之间的关联再次成为经济学家关注的热点。Fitoussi和Stiglitz^[1]认为, 危机爆发的结构性根源在于要素收入分配的失衡: 自20世纪80年代起, 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停滞不前, 收入不平等加剧, 由于工资收入的消费倾向普遍高于利润收入的消费倾向, 工资份额的下降通过抑制消费需求进而在长期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 由此引发危机。Rajan^[2]与Reich^[3]也认为, 美国穷人阶层和中间收入阶层在收入停滞的状态下保持消费的增加, 这是导致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不仅如此, Piketty^[4]利用长达两百多年的历史数据研究表明, 由于资本回报率持续高于产出和收入增长率, 资本报酬过高将导致资本主义走向无法支撑的不平等, 并进而威胁到市场经济赖以生存的公平竞争价值观。

危机爆发之前, 主流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并未对要素收入分配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Solow^[5]与Swan^[6]认为, 在边际生产力理论框架内, 各生产要素按其边际贡献获得回报, 要素的稀缺程度和相

收稿日期: 2018-09-14

基金项目: 中国人民大学重大规划项目“长周期视角下的世界经济: 现状与未来趋势”(17XNLG05); 中国博士后基金特别资助项目“房产财富、购房决策与居民消费不平等”(2016T90001)

作者简介: 李 育(1987-), 女, 山西长治人, 助理研究员, 博士, 主要从事对外投资、收入分配等方面的研究。E-mail: liyu251@pku.edu.cn
刘 凯(1985-), 男, 湖北汉川人, 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对外投资、宏观政策以及收入分配等方面的研究。E-mail: liukeynes@ruc.edu.cn

对价格总能使要素收入分配处在合理状态,要素收入分配也不会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事实上,对要素收入分配需求效应的研究主要是由后凯恩斯主义完成的,Bhaduri-Marglin 收入分配模型就是其代表性成果之一。Bhaduri 和 Marglin^[7]认为,劳动收入具有两方面的效应:一是作为消费需求的收入来源,提高其份额可增加消费需求;二是作为生产供给的成本,提高其份额有可能抑制投资需求和净出口。当前者的效应大于后者时,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可促进总需求的增长,此时的总需求体系为工资领导型(Wage-Led);反之,则属于利润领导型(Profit-Led)。

从中国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典型化事实出发,笔者认为,不仅劳动和资本报酬的分配会影响总需求,总的资本回报在住户部门和企业部门之间的分配也会影响总需求。这是因为企业获得的资本回报(即留存利润)是企业可直接调动的用于再投资的资金,因而其对于总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的拉动效应与住户部门利润具有一定的差别,忽略这种差别去考察要素收入分配对总需求的影响会导致有偏误的实证结论。

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劳动报酬份额和住户部门资本报酬份额持续下降已经成为一个基本共识,国内众多学者都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柳欣和王晨^[8]、沈坤荣和刘东皇^[9]与刘盾等^[10]认为,这一趋势必然会对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以及外部需求产生影响。相应地,1992—2012年中国总需求中消费需求比重从62.4%下降到49.1%,下降了13.3个百分点,而投资率从36.6%上升到48.3%,增长了11.7个百分点。李育和吕之望^[11]认为,尽管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需求总量仍然持续增长,在危机中并未发生明显下降,但总需求中消费和投资比例的失衡,以及这种失衡背后的收入分配因素依然值得关注。

然而,迄今为止,鲜有研究注意到中国总利润在住户部门和企业部门之间的分配问题。笔者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资金流量表数据,将总利润划分为住户部门利润和企业部门利润之后发现,近年来中国总利润的增长几乎完全是由企业部门利润增长拉动的,而住户部门利润份额基本保持不变,这意味着普通住户未能充分分享资本回报,大量利润留存在企业中。按照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留存在企业中的利润与分配给资本所有者的利润对总需求的影响是不同的,企业利润有更高的投资倾向,而住户利润消费倾向更高。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一是将资本回报划分为住户部门利润和企业部门利润,对要素收入分配的概念及其对总需求的影响进行拓展和深化;二是通过适当的调整方法,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资金流量表数据估算再分配之后的要素回报,在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估算上做出改进;三是利用多种计量分析方法对中国的需求体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将外部需求纳入总需求函数,得到较为稳健的结果和明确的政策含义。

二、文献回顾

后凯恩斯主义认为,不同类型收入的消费和投资倾向是不同的:工资的消费倾向大于利润的消费倾向;而利润的投资倾向大于工资的投资倾向。因此,当总收入中工资份额下降时,总需求中消费比例将会下降而投资比例将会上升。但问题在于,工资份额的下降抑制了消费的同时提高了投资,这时总需求会如何变动呢?Onaran等^[12]与Stockhammer和Ederer^[13]认为,这个问题需要通过实证检验来回答。按照边际递减规律,随着利润份额的不断增加,继续增加利润所带来的边际投资增量将下降,而由此带来的边际消费需求减少值将上升,因此,如果总收入中利润份额过高,那么继续增加利润收入对投资需求的拉动将非常有限,而对消费需求的抑制则非常强烈,从而在总体上抑制总需求;反之亦然。

由此可知,要素收入分配构成会影响总需求结构,国民收入中工资与利润应当保持适度的比例,否则就会对总需求产生抑制作用。刘盾等^[10]认为,要素分配对总需求的影响可分为利润挤压论和消费不足论,Bhaduri-Marglin模型正是对这两种理论的结合。在实证研究中,通过将要素收入分配纳入总需求函数,可以得到两者之间的数量变动关系:如果一个国家总收入中工资份额的上升引起总需求的增加,那么该国的总需求体系为工资领导型;反之,如果工资份额的上升引起总需求的下降,那么该国的总需求体系为利润领导型。围绕这一主题,国内外出现了大量的实证研究。黄乾和魏下海^[14]运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劳动报酬比重变动对国内需求和总产出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显示,

中国内需体系属于工资领导型,即提高工资份额有利于扩大内需。沈坤荣和刘东皇^[9]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对同一主题进行了实证检验,他们发现,1978—2007年,整体而言,中国的总需求体系为利润领导型,但从单个年份的数据来看,1995年和2007年的总需求体系为工资领导型。柳欣和王晨^[8]通过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论证,认为中国投资的高速增长和大量积累资本存量,使得工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下降,企业投资需求下降,最终引起有效需求不足。

但上述研究成果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工资全部归劳动者所有,但利润却归属于不同主体。按照后凯恩斯主义的研究,利润可以分为分配给股东的食利者利润和留存在企业中用于扩大再生产的非食利者利润,利润在这两者之间的分配显然也会影响总需求。Hein和Vogel^[15]认为,两方面的收入分配——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管理者和工人之间的分配——会在金融化的扩大效应下,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这正是后凯恩斯主义要素收入分配的核心,即食利者利润代表了股东力量,而非食利者利润代表了公司管理层的力量,股东更希望企业多分配利润,而公司管理层则更希望留存利润用于再投资。因此,股东和管理层相对力量的变化,影响总利润在食利者利润和非食利者利润之间的分配,而这一分配结果的影响又会反馈在消费和投资中。Onaran等^[12]利用这一方法,发现美国的总需求体系为工资领导型,减少食利者利润份额有利于扩大总需求。

三、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度量与测算

自古典经济学以来,生产要素的划分标准是不统一的。为了便于进行定量分析,本文沿袭目前多数实证研究的方法,将生产要素划分为劳动和资本,与之相对应的收入分别为工资和利润。此外,本文还关注利润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分配,将利润进一步划分为食利者利润和非食利者利润:总利润中进入住户部门的部分为食利者利润,而留存在企业部门的部分为非食利者利润。

(一) 税前要素收入分配

近年来,大量学者对中国的要素收入分配格局进行了测算,如张车伟和张士斌^[16]与吕冰洋和郭庆旺^[17]等。但这些研究因数据来源不同、计算方法差异、对统计口径的理解不同而结论各异。研究要素收入分配常用的数据来源有三个,即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资金流量表、按照收入法计算的分省GDP数据以及投入产出表,这三个数据来源各有优劣但反映的基本趋势并无太大差别。

本文对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判断基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92—2011年资金流量表(后文简称“资金流量表”)数据,选择该数据的原因有三点:一是从研究目的出发,本文的重点和创新点在于考察利润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分配,而资金流量表是唯一连续并能够反映国民收入在不同生产要素和不同经济部门之间分配格局的数据,这是其他数据无法实现的;二是经过比较分析,资金流量表与另外两个数据来源所反映的基本趋势和差别不大;三是此前对于资金流量表最大的争议是2004年劳动者报酬急剧下降是否由统计口径调整所致,但国家统计局在2012年对历年资金流量表数据进行了重新修订。修订后2004年数据较2003年下降幅度大大缩小,前后数据一致性增强,因此,可以判断,修订后的数据不再有前后统计口径不一致的问题,张车伟和张士斌^[16]的研究也支持这一判断。按照资金流量表的数据,我们可以推算历年的税前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其中,劳动要素收入等于劳动者报酬,政府部门收入等于生产税净额,资本要素收入等于初次分配总收入与前两者之差。按照修订后的数据,中国的劳动者报酬份额从1992年的54.6%下降到2011年的47.5%,下降了7.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资本报酬从1992年的30.9%上升到2011年的39.2%,上升了8.3个百分点;此间初次分配的生产税净额略有下降,下降幅度约为1.3个百分点。初次分配中各项收入的变化表明,1992—2011年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变过程是利润不断挤占工资的过程,劳动要素回报占初次分配总收入比重的下降反映了生产过程中资本回报率增速高于总收入和工资收入的增长速度。

(二) 税后要素收入分配

然而,初次分配中劳动、资本和政府所得收入并非是要素所有者真正获得的最终收入,在收入再分配环节,政府通过直接税和转移支付对要素收入分配格局进行调整,经过二次分配的收入格局才是最终决定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收入格局。因此,初次分配过程中劳动报酬的下降是否在再分配之后得以缓解就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根据资金流量表的数据结构,税前和税后的要素收入分配差异主要是由收入税、社会保险缴款、社会保险福利、社会补助和其他经常转移的变化造成的,其中,处理上较为复杂的是收入税。收入税是针对企业征收的企业所得税和针对个人征收的个人所得税。依据 Mendoza 等^[18]与吕冰洋和郭庆旺^[17]等关于税收的文献,企业所得税均作为资本税。企业所得税可以视作是税前资本分配份额的减项,但是个人所得税同时包括对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征税,我们需要对之进行拆解。具体拆解的方法是,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住户调查数据,将城镇居民家庭收入中的工资收入占比作为个人所得税中劳动征税的比例,总的个人所得税减去劳动征税即为资本征税,具体推算公式如下:税后劳动报酬=税前劳动者报酬-个人所得税×(城镇居民工资收入/城镇居民总收入)-社会保险缴款+社会保险福利+社会补助+其他经常转移;税后资本报酬=税前资本报酬-个人所得税×(1-城镇居民工资收入/城镇居民总收入)-企业部门经常转移净流出;税后政府部门收入=税前生产税净额+政府部门经常转移净流入=可支配总收入-税后劳动报酬-税后资本报酬。

调整后的要素再分配收入格局显示,1992—1999年再分配后的劳动报酬份额显著高于初次分配劳动报酬份额,再分配导致劳动报酬份额平均提高2.7个百分点。而2000年之后,政府再分配力度减弱,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劳动报酬份额相差不多,未能起到缓解劳动报酬下降的作用。与初次分配格局相比,再分配之后的劳动报酬份额在1992—2011年下降幅度更大,从1992年的56.9%下降到2011年的48.1%,下降了8.8个百分点,可见,政府再分配功能的缺失加剧了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趋势。

(三) 进一步划分利润份额

在后凯恩斯主义理论中,资本回报可分为两个部分:股东所得的投资分红和储蓄利息被称为食利者利润,留存在企业中用于再投资的部分被称为非食利者利润。在中国目前公布的统计数据中,与食利者利润和非食利者利润概念较为吻合的统计口径是资金流量表中住户部门资本报酬(主要包括住户部门的存款和证券利息获得、从上市公司获得的红利以及住户部门留存利润)和企业部门资本报酬(总资本收入-住户部门资本报酬)。

经过再分配调整后,1992—2011年总体资本报酬份额与企业部门资本报酬份额上升趋势基本保持一致,分别从1992年的25.2%和11.7%上升到2011年的34.8%和20.0%,而同期住户部门资本报酬份额则保持平稳,20年间仅上升了1.6个百分点。由此可知,挤占中国劳动报酬的主要原因在于企业部门的资本报酬,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留存大量的未分配利润,一方面,抑制了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如李扬和殷剑峰^[19]所指出的,也推动了国民总储蓄和总投资的增加。对利润的这一细分便于我们刻画中国企业部门收入过高的特点,这反映出中国资本市场发育的不完善,并未形成有效的股东收益分享机制,企业中的大部分利润都用于再投资,而进行分配的比例却很低,总利润的这一分配格局进一步推高了投资需求、抑制了消费需求。和宽泛的利润概念相比,后凯恩斯主义对食利者利润和非食利者利润的划分深化了要素收入分配的概念,也很好刻画了中国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主要特点。

四、理论模型

(一) 理论假说

借鉴后凯恩斯主义的研究思路,本文提出如下理论假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要素收入分配格局与总需求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总收入中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和资本报酬份额的上升抑制了消费需求、促进了投资需求和净出口。进一步,资本报酬中企业利润份额的上升加剧了这一效应。将要素收入分配对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净出口的影响进行加总,可得到要素分配的总需求效应。

(二) 模型设定

借鉴宏观经济学中支出法核算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基本定义,本文设定模型如下:

$$Y=C(Y, \Omega) + I(Y, \Omega, Z_1) + G(Y, Z_G) + NX(Y, \Omega, Z_{NX}) \quad (1)$$

其中, Y 为 GDP, C 为消费需求、I 为投资需求、G 为政府购买、NX 为出口 X 与进口 M 之差

(即净出口)。传统的总需求模型中较少关注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本文借鉴 Stockhammer 和 Ederer^[13]的研究成果,在总需求函数中加入劳动收入比重变量 Ω 。假定 Ω 对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有影响,而对政府购买无影响。 Z_I 、 Z_G 、 Z_{NX} 表示除总收入和收入分配之外的其他影响因素。

进一步地,Onaran 等^[12]提出,应将食利者利润和非食利者利润区分开来,方法是将利润报酬划分为食利者利润收入和非食利者利润收入,分别考察其各自变动对收入分配的总需求效应所产生的影响。本文借鉴这一思路,并结合中国的现实加以适当修正,具体方法如下:

1. 消费需求

考虑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消费需求是收入和工资份额的函数,即 $C=C(Y, \Omega)$ 。将国民收入分为工资 W 和利润 R ,由于工资的平均消费倾向高于利润的平均消费倾向,即 $C_W > C_R$ 。因此,总收入中工资份额的上升对居民消费有正的效应。利用计量回归得到消费的工资收入弹性 e_{CW} 和利润收入弹性 e_{CR} ,计算出 W 和 R 的边际消费倾向,进而可以估计 Ω 变动对消费率 C/Y 的边际影响如下:

$$\partial(C/Y) / \partial \Omega = e_{CW} \times C/W - e_{CR} \times C/R \quad (2)$$

进一步细分利润收入,借鉴后凯恩斯主义的方法,将利润 R 划分为食利者利润 R_r 和非食利者利润 R_{nr} 。定义利润份额为 π , 食利者利润份额为 π_r , 非食利者的利润份额为 π_{nr} 。假定食利者利润收入边际消费倾向为 C_{Rr} , 非食利者利润收入边际消费倾向为 C_{Rnr} , 有 $C_{Rnr} < C_{Rr} < C_W$ 。和 R_r 相比, R_{nr} 才是企业真正可以运用进行生产的资金,这部分资金更少用于消费。因此,居民消费函数变为 $C=C(Y, \pi_r, \pi_{nr}) \triangleq f(W, R_r, R_{nr})$ 。由此计算出 W 、 R_r 、 R_{nr} 的边际消费倾向,并进一步得到在 Y 不变的情况下, W 、 R_r 和 R_{nr} 相对份额变动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例如,在 Y 和 W 不变的情况下, R_{nr} 转化为 R_r 对消费需求的边际影响为 $\partial(C/Y) / \partial(\pi_r) = e_{CRr} \times C/R_r - e_{CRnr} \times C/R_{nr}$ 。同理,可得到在 Y 和 R_r 不变的情况下, R_{nr} 转化为 W 对 C 的边际影响,以及在 Y 和 R_{nr} 不变的情况下, R_r 转化为 W 对 C 的边际影响。

2. 投资需求

考察要素收入变动对投资的影响,并进一步细分利润收入,可以得到投资方程 $I=I(Y, \pi_r, \pi_{nr}) \triangleq g(W, R_r, R_{nr})$ 。在 Boyer^[20]与 Stockhammer 和 Ederer^[13]等后凯恩斯主义的研究中,随着公司中股东力量的上升,基于短期盈利能力的报酬体系将提高股东对管理层决策的影响。由此,更适合于描述收益率对投资影响的变量是 π_{nr} 而非 π_r , 因为 π_{nr} 代表了公司内部可以调动的资金,直接影响投资决策。

在 Y 不变的情况下,得到 W 、 R_r 和 R_{nr} 各部分份额的变动对于投资需求的影响。此外,对于投资函数的分析还需注意:一是我们的模型中并没有明确地包含企业负债总量,因而债务对投资的影响通过外生的食利者利润收入中的利息报酬的变化被包含进来;二是本文不会将利率纳入投资函数,这是因为资本的供求水平已经由 R_r 和 R_{nr} 衡量,无须通过利率反映。

3. 净出口

按照国际贸易理论,一国的出口函数主要由本国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和出口目标国的总需求水平决定,而进口函数则由进口价格、国内价格水平和本国的需求水平决定。具体考虑要素收入的变化:一是工资份额的上升会增加出口企业的名义单位劳动力成本 ULC ,进而降低本国出口品的价格竞争力和出口总额;二是 ULC 的增加会提高国内价格水平,从而增加进口总额。因此,劳动份额的上升对净出口的影响为正。具体的影响机制如下:

$$\frac{\partial X/Y}{\partial \pi} = \frac{1}{1-\beta_{ULC}} e_{P_{XULC}} e_{XP_X} \frac{X}{Y} \times \frac{1}{1-\pi} \quad (3)$$

其中, β_{ULC} 是 ULC 对国内价格的影响系数, $e_{P_{XULC}}$ 是 ULC 对出口价格的影响系数, e_{XP_X} 是出口价格对出口额的影响系数,式(3)最后两项将弹性系数转换为边际效应。

4. 总需求

假定政府支出不受劳动份额变化的影响,因而要素收入分配的变化对总需求的影响取决于其对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的影响。将要素收入变化对 C 、 I 和 NX 的影响加总,可得总需求 AD 的核算表达式为:

$$AD=C(Y, \Omega, \pi_r) + I(Y, \Omega, \pi_r) + G(Y) + NX(Y, \Omega, \pi_r) \quad (4)$$

首先，在消费方面，由于工资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利润收入，因而劳动收入比重提高对消费将产生扩张效应 $\partial(C/Y) / \partial\Omega > 0$ ；其次，在投资方面，劳动收入比重提高意味着资本报酬相对下降，因而对投资将产生抑制效应 $\partial(I/Y) / \partial\Omega < 0$ ；最后，劳动份额提高会通过降低出口产品竞争力和提高国内价格水平进而减少净出口。总之，劳动收入比重提高对总需求的净效应，取决于其对消费的正效应和对投资和净出口的负效应影响的相对大小。如果总的影响为正 $\partial AD / \partial\Omega > 0$ ，则总需求为工资领导型；如果总的影响为负 $\partial AD / \partial\Omega < 0$ ，则总需求为利润领导型，最终的综合效应需要通过实证研究进行检验。同理，进一步细分利润，不同类型的利润如何影响总需求也可以通过实证检验得到。

五、实证检验

(一) 变量的选取和检验

本文所涉及的变量 Y、C、I、G、X、M 定义同前文，其他变量定义如表 1 所示。计量分析由关于消费、投资、净出口多个方程构成。本文使用 1992—2011 年的数据，所有变量均采用自然对数形式。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符合进行协整分析的前提。按照标准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本文先验证了报告的各方程均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因而使用 Johansen 提出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VECM)。在变量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的前提下，OLS 估计与 MLE 估计同样可行，但由于 OLS 估计采用了 EG-ADF 两步法，会损失一个样本，因而本文的所有函数的估计以 VECM 结果为主要结论，同时以 OLS 估计结果作为稳健性检验。由于篇幅之限，本文不报告 OLS 估计结果，留存备索。

表 1 变量的定义

符号	名称	定义
W	税后劳动报酬	税前劳动者报酬-个人所得税×(城镇居民工资收入/城镇居民总收入)-社会保险缴款+社会保险福利+社会补助+其他经常转移
R	税后资本报酬	初次分配总收入-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个人所得税×(1-城镇居民工资收入/城镇居民总收入)-企业部门经常转移净流出
R _r	住户部门资本报酬	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劳动报酬
R _{nr}	企业部门资本报酬	资本报酬-住户部门资本报酬
P	国内价格水平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P _x	出口价格水平	出口总额/出口总量
P _m	进口价格水平	进口总额/进口总量
Y _r	主要贸易国 GDP	OECD 成员国 GDP 总量，不变价格

注：所有变量均以 1992 年价格衡量，以 CPI 折算。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二) 计量结果及分析

1. 函数估计

在对消费函数、投资函数和净出口函数进行估计前，先通过协整检验表明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本文所列表的全部 VECM 回归均利用协整秩检验 (Johansen Tests) 和最大特征值检验 (Max Statistic) 确定 VECM 的协整秩，利用 AIC 准则确定滞后阶数。估计完 VECM 后，通过 LM 检验确定残差无自相关；利用 JB 检验确定残差服从正态分布，最后确定 VECM 均为稳定系统。

消费函数的估计结果，如表 2 列 (1) — 列 (4) 所示。如列 (1) 所示，劳动报酬每增加 1%，消费需求增加 1.053%；资本报酬每增加 1%，消费需求增加 0.119%，因此，在总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将资本报酬转变为劳动报酬将导致消费需求增加。如列 (2) 所示，将利润划分为住户利润和企业利润之后，工资的消费需求弹性为 0.472，住户部门利润的消费弹性为 0.222，企业部门利润的消费弹性为 0.138。所有变量均显著，且 R² 值较为理想，模型整体显著性通过 F 检验。

为了确保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对消费函数采用了 MLE 和 OLS 两种估计方法，并改变函数形式以确保对不同生产要素边际消费倾向判断的稳健性。正如笔者所推测的那样，在每一个回归方程中，劳动报酬的边际消费倾向都是最高的，住户部门利润次之，企业部门利润最低，这意味着三者对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不同，提高劳动报酬份额、降低企业部门利润份额有助于提高消费需求。

投资函数的估计结果,如表2列(5)~列(8)所示。如列(5)所示,在Y不变的情况下,劳动报酬份额W/Y的上升对投资需求影响为负。将R划分为 R_r 和 R_{nr} 后,W的长期投资弹性为0.458, R_r 和 R_{nr} 的长期投资弹性分别为0.068和0.502,但 R_r 系数不显著,因此,我们将 R_r 和 R_{nr} 放在不同的模型中再次回归,如列(7)和列(8)所示,可以看到,在各回归方程中, R_{nr} 对投资需求的影响系数最大,这与理论预期相符。 R_r 的投资效应则低于W和 R_{nr} ,这表明对总利润进行细分是有意义的,不同主体持有的利润有着不同的投资倾向,住户部门利润对于投资需求的拉动作用有限。

表2 消费函数和投资函数的估计结果

模型	(1)	(2)	(3)	(4)	(5)	(6)	(7)	(8)
因变量	lnC	lnC	lnC	lnC	lnI	lnI	lnI	lnI
lnW	1.053***	0.472***	1.014***	1.124***		0.458**	0.970***	0.478***
lnR	0.119**							
ln R_r		0.222***	0.232***			0.068	0.207***	
ln R_{nr}		0.138***		-0.141***		0.502***		0.614***
lnY			0.353***	0.055	1.073***			
ln(W/Y)					-0.379***			
调整系数	-1.359***	-0.228*	-0.175	-0.102	-1.114	-0.677	-0.810***	-0.524*
常数项	-4.722	5.465	6.908	4.513	-1.849	5.071	3.649	4.578
R ²	0.998	0.994	0.979	0.979	0.991	0.980	0.996	0.984

表3 外部需求的估计结果(MLE估计)

模型	(9)	(10)	(11)	(12)
因变量	P	P_x	lnX	lnM
ln(W/Y)	4.096***	2.023***		
P_M	-0.401***	0.997***		
ln Y_f			6.709***	
P_x/P_M			-1.359***	0.055
lnY				1.419***
调整系数	-0.132	-0.773	-1.028*	-3.446***
常数项	4.877	1.268	-60.350	-5.077
R ²	0.835	0.652	0.854	0.957
协整秩	1	1	1	2
滞后阶数	4	4	4	4

外部需求的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先估计劳动份额变化对国内价格水平和出口价格水平的影响,如列(9)和列(10)所示,与理论相符,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提高了国内价格水平P和出口价格水平 P_x 。在列(11)中,以主要贸易国的GDP规模 Y_f 为代表的外部需求对出口影响为正,而相对出口价格水平 P_x/P_M 对出口的影响为负。最后,列(12)解释了进口函数的影响因素,Y越大,表明国内需求越旺盛,进口量也就越大,影响系数为1.419。

2. 边际效应分析

由于上述计量模型中的变量采用了自然对数形式,因而回归系数代表了弹性效应,若要分析收入分配格局变化对总需求的影响,应将各方程的回归系数放在可比的框架内,因此,需要将弹性效应转化为边际效应。具体的转化方法是用1992—2011年各指标的平均值,将弹性系数乘以对应变量的均值,即转化为边际效应。

分别考虑住户部门利润和企业部门利润的需求效应,利用1992—2011年各指标的平均值转化为边际效用后,W、 R_r 和 R_{nr} 对消费需求的边际效应分别为0.832、0.802和-0.282,符合 $C_{R_{nr}} < C_{R_r} < C_W$ 的理论预期,即工资对消费需求的促进效应最大,住户部门利润的促进效应次之,而企业部门利润对消费需求有抑制效应。W、 R_r 和 R_{nr} 对投资需求的边际效应分别为0.613、0.777和1.338,这同样与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假说相符。留存在企业中的利润对投资拉动效应最高,住户部门利润次之,工资的拉动效应最低。

由于要素收入分配对净出口函数的影响机制较为复杂,需要综合表3中列(9)~列(12)的回归结果才能得到结论,如表4所示。根据式(3)计算得到工资份额上升对净出口的边际影响为-0.474,即在总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劳动报酬每提高1个单位,净出口额将下降0.474个单位,与理论预期相符。

表 4 净出口边际效应的计算

	$1 / (1 - \beta_{ULC})$	$e_{P_x, ULC}$	e_{XP_x} (或 e_{MP_x})	$1 / (1 - \pi)$	X/Y (或 M/Y)	$\frac{\partial X/Y}{\partial \pi}$
出口	0.196	2.023	-1.359	1.890	0.450	-0.458
进口	0.196	2.023	0.055	1.890	0.390	0.016
总计						-0.474

表 5 表示工资份额增加对消费、投资、净出口以及总需求的影响。基准效应是仅考虑 Y 在 W 和 R 之间分配所产生的需求效应；住户部门利润效应是指保持 Y 和 R_{nr} 不变，1 个单位 R_r 转化为 1 个单位 W 所产生的需求效应；同理，企业部门利润效应是指保持 Y 和 R_r 不变，1 个单位 R_{nr} 转化为 1 个单位 W 所产生的需求效应；加权效应是指按照 R_r 和 R_{nr} 在 R 的比例，对其各自效应进行加权进而得到的 1 个单位 R 转化为 W 所产生的需求效应。

表 5 工资、利润对总需求的边际影响

	C	I	C+I	NX	乘数	Y
基准效应	0.676	-0.295	0.380	-0.474	1.360	-0.128
住户部门利润效应	0.013	0.045	0.058			
企业部门利润效应	1.160	-0.934	0.226			
加权效应	0.693	-0.548	0.145	-0.474	1.370	-0.450

综合分析表 5 的各种效应，我们发现，无论采用何种计算方法，工资份额增加导致的消费需求增加幅度大于投资需求下降幅度，国内需求 (C+I) 增加，国内需求体系为工资领导型。加入外部需求之后，中国总需求变为利润领导型，这是因为工资份额增加对净出口的负效应非常明显，从而导致总需求下降。具体的边际效应是：1992—2011 年 1 个单位的工资转化为利润将平均导致消费需求增加 0.676—0.693 个单位，投资需求减少 0.295—0.548 个单位，净出口需求减少 0.474 个单位，加总后得到内需增加 0.145—0.380 个单位，总需求将减少 0.128—0.450 个单位。由此可知，这段时期中国资本报酬份额的上升对总需求有正效应，对内需有负效应。进一步比较住户部门利润和企业部门利润的需求效应，从表 5 可以看出，减少企业部门利润比减少住户部门利润对内需拉动幅度更大，由此可知，利润、尤其是企业部门利润过高是抑制中国内需的原因之一。而将住户部门与企业部门的利润份额加权之后，得到的基本结论与基准效应一致。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借鉴后凯恩斯主义要素收入分配模型，将国民收入中的资本报酬分为住户部门利润和企业部门利润，测算中国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要素分配格局，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要素收入分配的总需求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总体而言，1992—2011 年中国初次分配中利润份额不断上升，这主要由企业部门利润增加所致，而同期住户部门利润则始终在低位徘徊。这表明，中国要素分配格局的变化与经济部门之间的收入分配密切相关，住户部门不仅未得到足够的工资回报，其资本回报也处于较低水平，大量国民收入以留存利润的形式进入企业，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主要由企业部门获得。

住户部门收入下降不仅不利于居民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也对中国的内需产生了负面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整体而言，1992—2011 年中国的内需体系是工资领导型，劳动报酬份额的上升有助于提升总需求。这是因为中国的劳动报酬占比不仅远低于多数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而且近年来始终呈下降趋势，这就导致增加劳动报酬带来的边际消费需求增加量大于边际投资需求减少量，对总的内需将产生正效应。将外部需求纳入模型后，计量回归结果显示，劳动报酬份额上升通过增加劳动力成本进而抑制了净出口，并且这种抑制效应较强，甚至超过了对内需的拉动作用。这说明中国的贸易顺差对低成本劳动力的依赖性很强，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预期下，未来中国净出口将受到严重影响，贸易顺差难以维持。

进一步将利润划分为住户部门利润和企业部门利润后，笔者发现，企业部门利润份额过高是抑制内需最主要的因素。当前中国企业部门利润不断增长，其产生的边际需求拉动效应必然不断下降。由

此可以得知,中国的要素收入分配抑制内需的原因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住户部门资本回报过低;二是住户部门劳动报酬过低,这两大原因又可归结为同一个原因,即住户部门收入过低。相应的政策含义是:提升住户部门收入和劳动报酬,提高住户部门的资本回报,对于扩大内需有积极的作用。因此,从扩大内需、降低外贸依存度的目标出发,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增加住户部门利润分配是改善中国要素收入分配格局、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之一。

参考文献:

- [1] Fitoussi, J. P., Stiglitz, J. The Ways Out of the Crisis and the Building of a More Cohesive World [R]. Observatoire Francais Des Conjonctures Economiques, 2009.
- [2] Rajan, R. G. Fault Lines: How Hidden Fractures Still Threaten the World Economy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121-129.
- [3] Reich, R. B. Aftershock: The Next Economy and America's Future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LLC. 2010. 21-25.
- [4] Piketty, T. 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8-38.
- [5] Solow, R. M.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6, 70(1): 65-94.
- [6] Swan, T. W. Economic Growth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J]. Economic Record, 1956, 32(2): 334-361.
- [7] Bhaduri, A., Marglin, S. Unemployment and the Real Wage: The Economic Basis for Contesting Political Ideologies [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0, 14(4): 375-393.
- [8] 柳欣,王晨. 经济波动中的收入分配与有效需求——基于1990—2007年中国数据的再检验 [J]. 当代财经, 2009, (4): 10-16.
- [9] 沈坤荣,刘东皇. 中国劳动者报酬提升的需求效应分析 [J]. 经济学家, 2011, (2): 43-50.
- [10] 刘盾,施祖麟,袁伦渠. 利润拉动还是工资拉动?——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 [J]. 南开经济研究, 2014, (2): 3-29.
- [11] 李育,吕之望. 收入分配、金融发展与宏观风险: 一个文献综述 [J]. 金融评论, 2011, (4): 110-116.
- [12] Onaran Ö., Stockhammer, E., Grafl, L. Financialisatio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Aggregate Demand in the USA [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1, 35(4): 637-661.
- [13] Stockhammer, E., Ederer, S. Demand Effects of the Falling Wage Share in Austria [J]. Empirica, 2008, 35(5): 481-502.
- [14] 黄乾,魏下海. 中国劳动收入比重下降的宏观经济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J]. 财贸经济, 2010, (4): 121-127.
- [15] Hein, E., Vogel, L. Distribution and Growth Reconsidered: Empirical Results for Six OECD Countries [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8, 32(3): 479-511.
- [16] 张车伟,张士斌. 中国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动与问题——以劳动报酬占GDP份额为视角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0, (5): 24-35.
- [17] 吕冰洋,郭庆旺. 中国要素收入分配的测算 [J]. 经济研究, 2012, (10): 27-40.
- [18] Mendoza, E. G., Razin, A., Tesar, L. L. Effective Tax Rates in Macroeconomics: Cross-Country Estimates of Tax Rates on Factor Incomes and Consumption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4, 34(3): 297-323.
- [19] 李扬,殷剑峰. 中国高储蓄率问题探究 [J]. 经济研究, 2007, (6): 14-26.
- [20] Boyer, R. Is a Finance-Led Growth Regime a Viable Alternative to Fordism? A Preliminary Analysis [J]. Economy and Society, 2000, 29(1): 111-145.

(责任编辑:徐雅雯)

[DOI]10.19654/j.cnki.cjwtyj.2018.12.013

[引用格式]李育,刘凯. 宏观收入分配格局对总需求的影响 [J]. 财经问题研究, 2018, (12): 96-104.